

#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弘扬民族文艺优秀传统

徐安怀

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学艺术遗产,推陈出新,古为今用,这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说:“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那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半个世纪以来,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所阐明的这一思想,曾给予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包括古代文学研究以有力指导和深刻影响,至今仍是我们弘扬民族文艺优秀传统,推进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指导方针。

今天,在纪念《讲话》发表五十周年的时候,重温毛泽东同志关于批判继承文艺遗产的指示,这对澄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思想理论上所制造的混乱,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更具有特殊的意义。在前些年,文艺领域内的一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所谓“文化精英”,他们紧密配合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和平演变”的攻势,恣意歪曲、攻击历史唯物主义,全盘否定民族文化和文艺,鼓吹“全盘西化论”,公开向毛泽东思想、向社会主义进行挑战。面对这种挑战,我们只能按照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提出的要求,“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通过这场思想斗争,清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澄清歪曲、攻击历史唯物主义的形形色色观点所制造的混乱,以使我们沿着“为了人民大众”的方向,大力弘扬民族文艺的优良传统,建立起无愧于祖先和后代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艺。

在文艺遗产的研究中,歪曲、攻击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表现有哪些呢?我们择其要者,谈以下三种。

一是鼓吹“文艺的非功利性”,否定古代文艺所具有的善恶观、是非观和时代性、阶级性,诋毁具有崇高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古代优秀作家。

“非功利性”,曾是前些年文艺界一些人的热门话题。“非功利性”的主张者,把文艺创作视为纯生物、纯生理、非意识、非理性、非社会的人的本能的表现。他们要求文艺大谈人的本能,人的七情六欲,谈非理性,而不能谈社会,不能谈理性,不能谈集体主义,不能说真善美。有人公开声称:一个人不用那么多的责任感、使命感,只要忠实你自己,完成你自己,对自己的信仰就像教徒对上

帝似的狂热,没有过多的道义好讲。并进而攻击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说什么我们长期以来强调集体主义,强调工农感情,对“促进人格尊严”起了“阻碍作用”,卖力地宣扬极端个人主义。有人则否认文艺对真善美的追求,他们认为,“文艺承受不了真善美这样巨大的课题,真善美是崇高的,但对艺术来说却是可悲的”。他们要求改变观念,要求把文学史看或“人类心灵发展史”,要求充分肯定表现“人欲”的作品。当这股“非功利性”思潮泛滥的时候,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也紧锣密鼓,对“功利性”的文艺观和作家作品展开了一次空前的大“围剿”。

这场大“围剿”所涉及的方面极广,就其重点而论,大体可概括为三:第一,将“诗言志”和追求真善美的文艺观,攻击为是排斥个性张扬的“实践理性”,认为这种文学功利性主张不仅使作家付出了表失个性与真情的重大代价,“为我们民族留下了说大话、空话、谎话的历史积淀”;而且成为阻碍中国文学发生根本性转变的重要原因。他们要求古典文学的研究要张扬个性,大谈人欲,充分肯定以南朝“宫体诗”为代表的表现人的本能和性欲的作品。他们说,宫体的出现同人的觉醒有着深刻的关联。从萧纲的“立身先须谨慎,文章且须放荡”,到陈叔宝们的创作,包括封建帝王在内的人们七情六欲得到了大胆(有时也就难免过度)的表现,这应该视为被儒家伦理道德异化了的人性的复归,是文学挣脱史学、哲学、政治伦理学束缚而走向人学的初步标志。主张将“诗言志”和所谓“实践理性”这类抑制人的本能和禁欲的观点都统统逐出文艺王国。第二,否认现实主义是古代文学的优良传统。他们认为文艺所写的现实总是意味着对某种主体而言的现实,它已经被主体所解释了,因此文艺也就无所谓“本来面目”的现实,也就无所谓现实主义。《诗经》和汉乐府被尊奉为中国文学现实主义的源头,实际上是后人给它们套上的笼头,它们不是什么现实主义,它们的真正作用是以功利态度去规范文学,只能算作是一股原始性、写实性的表现主义思潮。第三,肆意贬低和攻击古代优秀的作家和作品。有人对屈原的爱国精神深恶痛绝,认为他为国家为理想殉身是“愚忠”,是“丧失主体自我意识”,因此屈原的人格是“自觉奴性人格”,不值得肯定。有人一笔抹煞汉代诗歌,说什么汉代的诗歌无足观也不足谈,乐府诗得到一些文学史家的重视,主要的不是因为具有多高的诗美价值,而是由于它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有人认为推动文学向前发展的动力是作为个体生命力存在的人的感性冲动,即情,而李白是唐代主“情”的高峰,所以唐代文学的成就只能以李白为代表,而杜甫、元稹、白居易、韩愈、柳宗元之流,总体倾向是实践理性掩过了情,尤其是白居易的并不成功的讽喻诗,则以矫情意味着自我的部分失落,因此他们对唐代文学的发展并没有起到推动作用。以上种种对“功利性”指斥、诋毁的论调,他们所否认的是文艺的社会性,作家的责任感。他们所要求的是按照资产阶级的极端个人主义和腐朽的人生观来规范文艺和改造文艺。事实上,文艺的功利性是客观存在,这是任何人都否认不了的。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早已指出:“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以“非功利”来鼓吹极端个人主义,以“非功利”来瓦解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实际上也是一种“功利”,只不过鼓吹者羞羞答答没有明言罢了。契诃夫说得好:“文学家不是糖果贩子,不是化妆专家,不是给人消愁解闷的;他是一个负着责任的人,受自己的责任感和良心的约束。”<sup>①</sup>旧时代真诚的艺术家尚且强调功利和责任感,而自诩为“文化精英”的“非功利”论者,却把具有崇高责任感、使命感的爱国诗人丑化为“自觉奴性人格”,这种“非功利”的弦外之音,难道不值得人们深思和警惕吗?

二是鼓吹“剥削与压迫是历史进步的必然形式”,美化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否认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

谁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早已作出了明确的回答:人类历史首先是生产发展的历史,是生产方式更替的历史。由于人民群众是生产活动的主体,而他们的生产活动又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所以历史也就是物质资料生产者的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历史。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也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但在前些年,却有一批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观点颇不以为然。他们以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进行曲解为手段,说什么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阶级对抗”,主要指的不是被剥削者、被压迫者反剥削、反压迫的冲突斗争,主要或在大部分场合是指阶级剥削和压迫本身。他们说:在马、恩看来,没有剥削压迫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的发展直到资本主义社会所遵循的规律。因此,肯定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必须在首先肯定封建剥削与压迫依然具有巨大的历史合理性的前提下进行。进而他们叫嚷道:“多年来占统治地位的‘只有人民创造论’该逐出理论领域了吧!”

通过曲解马克思主义,用否认阶级斗争来否认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这种手法是拙劣的。马克思1852年3月在致约·魏德迈的信中就明确地说过:“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sup>②</sup>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确立,正是以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相信无产阶级既能解放自己也能解放全人类为前提的。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又会出现美化剥削制度、否认“人民创造论”的论调呢?这一点,马克思也早有预料,马克思说:“为历史所证明的古老真理告诉我们:正是这种社会力量(指过了时的社会力量——笔者注)在咽气以前还要作最后的挣扎,由防御转为进攻,不但不避开斗争,反而挑起斗争,并且企图从那种不但令人怀疑而且早已被历史所谴责的前提中作出最极端的结论来。”<sup>③</sup>

历史沉渣泛起,当然不足为怪。但这种假借马克思主义之名而泛起的所谓“剥削、压迫是历史前进动力”的沉渣却极带欺骗性,因此它们在历史研究和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所制造的混乱也就特别严重。这种严重混乱的表现有哪些呢?一则认为文学发展的历史是剥削阶级的发迹史,封建社会的文学只能歌颂封建主义,即使到了近代社会的太平天国时期,封建主义也仍然是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旗帜,不能动摇。而农民在封建社会与地主是一回事,起着同样的作用,具有同样的性质,即使是农民起义,他们所反对的也不是封建剥削和压迫,而是在平衡正常的剥削和压迫,因此农民不具有也不能具有反封建的要求,自然也没有反封建的斗争,所以,在古代也不存在反封建的文学。他们举《诗经》的风诗和汉乐府为例说:这些民间创作其实都不具有反封建的特征,它们的真正作用是通过民歌反映情况来改良政治,巩固封建统治,其实都是赞成剥削和压迫的。二则宣称劳动人民并不始终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和趋势,劳动者要求摆脱剥削、压迫、苦难的空想,并不能产生进步。如果只站在历史上劳动者的立场来看待历史的发展,就只能否认人类文明史,从而下意识地主张人类应永远停留在原始的“野蛮半野蛮”状态。因此,他们认为,揭露剥削、压迫罪恶以及描写人民群众反抗斗争的文学作品,都不具有历史进步的作用,陶渊明的“桃源世界”也只是一种复古倒退思潮的反映,在历史上也无多少积极意义。三则视劳动人民为愚昧的群氓,认为

民间创作粗糙低级,缺乏个性,不过是群体意识的非自觉艺术化,本能的宣泄而已,既谈不上格调的高雅,也说不上艺术功底。因此人民的创作算不上艺术;即使是到了今天,人民也只能是被启蒙、被改造的对象,而文艺同这种“新启蒙”相适应,其出路就只能是“化大众”,而不能“大众化”。如此种种否定人民群众历史作用、否定人民群众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的观点,实际上是“帝王中心论”、“上智下愚论”的翻版,并无多少新鲜货色。但宣扬这些观点的人却自诩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反而指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冒牌的”,他们说:“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必定是‘反剥削反压迫’的观点,是后来的一些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附加上去的东西,必须坚决清除”。这种以假乱真的现象给人们敲起了警钟,它提醒人们一定要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一定要用历史唯物主义去撕下历史唯心主义的画皮。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说得好:“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也有这样的一种人,他们对于人民的事业并无热情,对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战斗和胜利,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他们所感到兴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颂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经营的小集团里的几个角色。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当然不愿意歌颂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这样的人不过是革命队伍中的蠢虫,革命人民实在不需要这样的‘歌者’。”这里说的虽然是文艺创作,但对古典文学研究也是适用的。我们希望反对“人民创造论”者能够猛省,不要继续滑下去,成为革命队伍中的蠢虫!

三是鼓吹“文艺非意识形态化”,宣扬资产阶级文艺观,否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对文艺遗产研究的指导作用。

文艺是意识形态或称之为观念形态,这是马克思主义反复阐述的观点,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问题。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论述“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时,列举了法律、政治、宗教、艺术、哲学等,并称之为“意识形态”。恩格斯在致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则进一步分析了这些意识形态间的关系以及同经济基础的关系。恩格斯说:“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sup>④</sup>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也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而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同志还说过:“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据此可知,文艺作为意识形态,这本是马克思主义早已解决了的问题。然而,在过去一段时间,一些“文化精英”打出纠正“国内现行的传统文艺理论体系”偏颇的旗号,公开把矛头指向毛泽东文艺思想。他们说,我们的文学批评从30年代开始到现在,大体上是一种单一的线性思维方式和机械决定论。为了“破”所谓的机械决定论,他们集中火力攻击意识形态理论,说什么意识形态理论中的“一定的文艺是一定的政治经济的反映”的观点,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而是旧唯物主义的机械反映论。认为这一观点的实质是把文艺当作无主体、无创造性的被动反映的产物,其根本弊病就在于割断了文艺与主体的血肉联系,把文艺归结为现实的被动反映,这就使得文艺丧失了“自由的精神生产”的特殊本质。因此,他们要求文艺挣脱意识形态的束缚,脱离政治经济,超越现实,直接进入自由的领域。

很明显,这种“文艺非意识形态化”的论调,是直接针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们的社会存在决

定人们的意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然而他们所标榜的关于脱离政治经济、超越现实、直接进入自由的领域的主张,实在也不是什么新鲜的玩意,无非是套用18世纪末叶席勒关于“通过自由去给予自由,这是审美的王国中的基本法律”<sup>⑤</sup>的观点而已。当然,席勒的观点也并非痴人说梦,毫无意义。朱光潜先生评论说:席勒认为“人只有从形象显现的观照中才能获得完全的自由,这种思想仍然是发挥康德的‘不涉及利害的观照’说,席勒的独到见解在于把审美的自由看作政治自由的基础”,“它反映出当时德国知识界的一种相当普遍的心理倾向:对德国现实的庸俗鄙陋深为厌恶,想逃到一种幻想的乌托邦里去求安身立命之所”<sup>⑥</sup>。也就是说,席勒的文艺观是当时德国现实生活的曲折反映。这正好也证明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科学性,席勒的“自由”也并非超越现实、脱离政治的自由。

同宣扬抽象的自由相联系,“非意识形态化”的鼓吹者还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深入生活”的观点。他们举《红楼梦》为例,说道:没有曹雪芹,《红楼梦》必不存在;由于文艺创作具有很强的不可重复的个体精神生产的特性,这就决定了它对杰出的艺术大师的依赖的不可替代。所以与其说有什么样的生活决定了有什么样的文学作品产生,不如说有什么样的作家才会有什么样的作品,这样说还来得更实在些。接着,他们对“深入生活”论大加挞伐,攻击说:把生活抬高到决定一切、重于一切的地位,势必便会把创作主体置于一种奴从与被决定的地位,这其实是一种机械决定论的观点。抛开特定的创作主体去谈论什么生活,最终只会产生这种非人的文学。他们的这番议论将文学的主体性同文学反映论相对立,本身就已偏离了唯物主义的轨道,陷入了唯心论。诚然,文学创作离不开作家,文学创作不能机械地照抄生活,必须充分发挥创作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但是作家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外星人”。他的思想观念,艺术追求不可能摆脱历史的、现实的社会环境和意识形态的制约。就作家与生活的关系而言,不是作家决定生活,而恰恰相反,是包括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在内的社会生活影响作家。即以《红楼梦》而论,既然它是“描写封建社会盛衰史”,社会生活也就自然成为它产生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在这里,主体性与熟悉生活是统一的,绝不是对立的。读者接受《红楼梦》,也因为它以艺术的方式成功地再现了时代和生活的本质,而不是因为它背离了社会生活。至于作家情况,读者往往是不求甚解的。事实告诉我们: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这不是什么机械反映论,而是被古今中外的文艺实践所证明的真理,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

此外,“非意识形态化”的鼓吹者,还大力提倡引进新理论、新观念,企图以此来取代他们所谓的意识形态理论。引进什么样的新观念和新理论呢?大概是“现代主义或现代意识”吧。于是一时之间,新概念漫天飞舞,新理论五花八门。有的提倡文艺必须充满人道主义感情,并要求读者阅读作品时要对艺术形象倾注纯真的爱,甚至对恶人也不单纯是憎恶,而是须渗透审美的怜悯,不要带上政治色彩。有的宣扬文艺应描写荒诞,描写虐待狂,描写人的孤独,给人以刺激,使人痛感人生是一场悲剧,他们说,文学在其本质上是悲观的,乐观往往是非文学的,审美活动不推动历史前进,文学也不是改造世界的什么武器。企图以世纪末的颓废情调来瓦解人心。有的鼓吹中国文学的出路在于向西方学习,他们认为“五四”以后新文学之所以取得成就,并非因为作家与时代、群众相结合,而是由于以全面开放的态度迎接了西方文学,把西方的个性张扬和完全非理性带进了文学,从而给中国文学输入了新的血液,中国文学终于在西方文化精神的洗礼下,开始了新的征程。这实际上是弹起了“全盘西化”的老调。

综观上述“非意识形态化”的种种论调,其锋芒全是针对马克思主义,针对历史唯物主义的,

也是针对我党所提出的文艺的“二为”方向的。要同这些错误观点进行斗争,我们就必须首先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认真学习历史唯物主义。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说:“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但是现在有些同志,却缺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比如说,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就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却把这个问题弄颠倒了,说什么一切应该从‘爱’出发。就说爱吧,在阶级社会里,也只有阶级的爱,但是这些同志却要追求什么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这是表明这些同志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很深的影晌。应该很彻底地清算这种影响,很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创作,这是对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这番话虽是五十年前的老话了,但今天重温它,仍感到十分亲切。它对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批判“非意识形态化”谬论,依然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

以上三种主要表现,当然不能概括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时期歪曲、攻击历史唯物主义的错误观点的全部内容。我们举出这三种,对它们做一些粗浅的分析,目的是说明在文艺遗产的继承问题上,围绕要不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而展开的斗争,还将是长期的,有时甚至是很尖锐、激烈的。作为生活于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研究工作者,理所当然地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唯一科学的说明历史的学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在同唯心史观的斗争中,运用唯物论与辩证法相结合的崭新的世界观和科学的方法论,找到了历史研究的新出发点,即人类社会、人们的社会关系(首先是生产关系)、具体的物质生活条件,而形成的关于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阶级和阶级斗争、国家和革命、无产阶级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的完整学说。这种学说不仅仅是无产阶级的理论思维,而且由于它继承发展了几千年来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因此又是经受得起任何检验的科学的理论思维。只有运用这种学说来观察社会、研究历史、清理文艺遗产,才能在错综复杂的现象中,发现隐蔽着的客观规律,获得科学的认识。也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我们也才能清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所鼓吹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恶劣影响,从而保证文艺遗产研究沿着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顺利发展。反之,如果放弃了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文艺遗产研究会迷失方向,陷于混乱;而且唯心主义泛滥,对社会主义事业也将产生严重的破坏作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所留下的教训,是值得人们永远记取的。

让我们在毛泽东同志《讲话》所阐明的文艺思想的指导下,更自觉地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大力弘扬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文学艺术遗产,为创立马克思主义的古典文艺研究科学,为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 注释:

- ①《写给玛·符·塞金列娃》,《契诃夫论文学》第35页。
-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2—333页。
- ③《反教会运动——海德公园的示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第363页。
-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页。
- ⑤《审美教育书简》第二七封信,转引自朱光潜主编《西方美学史》(下)第456页。
- ⑥朱光潜主编《西方美学史》(下)第456页。